

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s Desk

饶恕和解与认罪忏悔概念的缺乏

黄保罗

(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讲座教授, 吉林 长春, 130012)

在 2013 年 11 月浙江大学举办的“基督宗教与中华民族的复兴梦想：基督宗教在中华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学术研讨会”之神仙会上，我作为特约嘉宾所作的主旨发言是“基督宗教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战略性意义”。其中我特别强调，清理苦毒记忆与饶恕，对于个人的心理健康及整个民族的文化建设都具有的重要意义。所谓苦毒(Bitterness)，表示个人或民族因所受到(或自以为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而产生的委屈和消极情绪所引起的伤害、痛苦与毒性影响。我们不仅从历史中而且更在急剧变化的现实中，都能看到许多的个人心理(记恨与委屈)与民族历史(近代以来的屈辱记忆)的苦毒。处理的方式可以很多，如：1) 在沉默中灭亡(被迫的忍耐导致自戕)；2) 在沉默中爆发(以暴力来报复)；3) AQ 精神(自我欺骗)；4) 将委屈转化为病态的动力而发愤图强(以民族情与强国梦为动力的病态发展，如，以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不平等条约、被日本侵略等苦毒记忆为动力，在物质上虽然发展了，但心理、精神和价值观念却带有金钱主义、冲突论、后殖民主义论、新左、极左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特点)；而我主张的选择则是：5) 积极地饶恕甚至和解。当时，我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积极讨论，但多人觉得：虽好，却难以实现。

今(2014)年4月，我到韩国参加了由美国普度大学主办的“The Christian Forum for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in Northeast Asia”(东北亚和平与和解基督教论坛)，有机会面对面地与来自中国大陆、香港、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基督徒学者及教会领袖探讨和平与和解的问题。面对中日矛盾、韩日矛盾、中美矛盾、中韩矛盾、韩国与朝鲜矛盾、中国大陆与台湾关系、及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内部冲突与仇恨等等，切身地感受到，东北亚现在既是经济政治上最活跃的地区，但同时也像一个炸药桶一样充满危险。特别是，当我看到一位日本的86岁高龄的老牧师为日本二战罪行的一次又一次道歉、看到来自长崎的一个受二战时核辐射影响之人的后代、几个深受福岛核泄露事故影响的基督徒、以及内心充满记恨苦毒的各个国家的人们，我实在感到和平与和解的重要。但这里遇到的核心是：真相、认罪、忏悔、饶恕与和解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就基督教的信仰而言，认罪忏悔是一个人接受和相信基督并因此罪蒙赦免的前提，因为前者虽不是后者的充分条件，却似乎是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当你认罪、忏悔、相信基督，基督才会饶恕与赦免你的罪。从经验的层面而言，这是每个基督徒的生活和生命之经历。这是大部分的华人基督徒都接受和遵循的教义。可是，这种教义带有严重的靠行为得救的律法主义倾向，即认罪、忏悔和相信，似乎都是人要做出来的“行为”。如此以来，就与基督新教所强调的“因信称义”和“唯独恩典”的教义相矛盾了。

耶稣基督说：“是我拣选了你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恩典在前，接受、相信与悔改在后，这是基督新教特别是马丁路德所强调的恩典与爱的次序，完全不同于世人强调的“犯罪者受惩罚、先认罪悔改、

然后才有可能得到饶恕”的公义次序。

但是，在“犯罪—惩罚—报复 / 犯罪—重新惩罚”的无止境循环链条中，永远是“恨换来恨”。只有在某个环节上，一个受害者愿意放弃为自己寻求公义，愿意甘心牺牲自己的利益而采取饶恕而不是惩罚与报复的方式，主动地改变“以恶制恶”的范式，代之以新的“爱仇敌”的范式，上述的恶性循环链条才可能被打破。耶稣基督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因此，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认罪、忏悔、相信和接受”耶稣基督，都是因为上帝已经先设定了耶稣基督为人类的死亡和复活、并且把“信”这个种子作为礼物赠送给了人们，借助圣灵的帮助并常常通过人的被动反应，一个人才可能有“认罪、忏悔、相信和接受（基督）”的经历；就此意义而言，得救的前提并非人的“行为”，而是上帝的恩典与拣选；这带有人无法完全理解的神秘主义特点。这是基督教文化的根基与本质。只有理解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才可能来谈论饶恕和解与认罪忏悔的是否可能以及应该如何进行等问题。

就我对东北亚地区的观察，以中日关系为例，我发现部分中国人仇恨日本的主要原因，是部分日本人不认罪忏悔，并且否定二战时的罪行真相，因此，中国人难以饶恕日本并与之和解。这里我们中国人遵行的是“公义”的原则，是无可厚非的。那么，部分日本人为什么不承认二战时的犯罪真相而认罪忏悔呢？一则可能他们从认识论的视角而言，根本不认为自己错了，自以为是，认为“举世皆浊，唯我独清；举世皆醉，唯我独醒”，比如有人认为战争没有是非而只有胜负，根本不存在战争是否正义的问题，所以就不认罪。二则有人可能从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日本只是败给了美国而不是中国，因此，日本只向美国臣服，而不愿意向中国臣服和道歉、认罪与忏悔。三则有人可能从实用主义的视角而言，担心与害怕：若认罪与忏悔，可能会在道义与实际生活中陷入被中国永远谴责与惩罚的境地，故而即使知道自己错了，也不愿意承认。这三种自以为义的认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价值观念与实用主义的本质在于没有“恩典”的概念，既缺乏对“认罪忏悔”的认识而去乞求他人给予恩典，又缺乏对“饶恕和解”的认识而愿意主动给予他人以恩典。

在一个缺乏绝对的外在超越的东北亚文化圈里，儒家的自以为义的乐观人性主义，不仅在认识论上使得真理无法被纯洁地保持在形而上之域，常被俗人侵扰，而且在实践论上很容易制造出许多虚伪的君子与圣人，既不承认自己有罪，又对他人缺乏饶恕与和解。因此，犯罪者一方面在无意识的层面中不认罪而自以为义，另一方面又在有意识的故意层面中不敢认罪而深怕被惩罚。同样，受害者一方面在有意识的层面中抓住对方的罪恶而不愿饶恕与和解，另一方面又在无意识的层面中不知道自己也是个罪人。

区分 *Coram Deo*（人与上帝的关系）与 *Coram Mundo*（人在世界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马丁路德所特别强调的。在人与上帝的关系中，人是永远无法通过自己的行为而恢复与上帝和解的，只有依靠上帝的爱、恩典、救恩，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而复活，将一种和解的美好关系作为礼物赐给人，而人只能通过“信”来被动地接受。在世界上人与人的关系中，依靠“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行为轨迹，是真实的存在，但却是痛苦的存在，需要借助从前一种人与上帝关系中所获得的圣爱（*agape*）力量，来改变已经畅行的规则，从而才在不可能中找到可能、在绝望中找到希望。儒家在世界的人与人关系中，有许多重要而美好的论述；但缺乏明确地人与上帝关系的论述，而这正是基督教与儒家在饶恕等概念上的主要特色与差异。

因此，在2014年5月的第三届尼山论坛中，我作了“儒家与基督教中的饶恕概念”，来试图做类似上述的探讨，以期为走向全球化世界中担任领袖角色的中国文化提供一个参考的视角。我强调的核心是，在东北亚儒家文化圈中，缺乏对饶恕和解与认罪忏悔概念的认识。但是，5月20日聆听了第三届尼山世界闻名论坛的第一场、由尼山论坛副主席、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 / 行政总裁刘长乐主持的、由尼山论坛主席、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许嘉璐和美国的地理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William Engdahl）参与的明湖高端对话“信任与伦理：文明对话的共同责任”。我意识到，论坛所邀请的这位大师，不仅无法为深陷自以为义的儒家提供参考，而且把自己的理性和自以为义当作了批判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

来的种种弊端的唯一工具。对话中特别强调对“爱”的追求，却在笔者提问之前根本没有触及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圣爱”概念；对话中特别强调对“假神”、强权和邪恶手段的反对，甚至使用了“愚蠢”一词来称呼比尔盖茨等世界富人，但是却没有提及基督教的“原罪”概念；对话中特别反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大力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传统并对中国的文化复兴加以赞扬，却没有真正提及超越的上帝。这种解构性的以理性为根基而抛弃上帝的人文主义批评，其本质是以一种解构的自以为义去批判另一种久已存在的自以为义，完全缺乏超越的绝对标准，除去引起国人的民粹激情以外，可能会让批西亲中的恩道尔大师成为部分人心中的“新神”；但这并没有给世界与中国带来认罪、饶恕或和解，在迎合部分儒家人士的心理之外，这位大师并没有跳出理性至上的盲目乐观主义；当他只使用理性作为批判的工具时，他就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视为“聪明的”义人和“假神”，而这将使他不久即会成为另一批人解构的对象，重新陷入与他所批判的对象相同的范式之中。

由于对超越、原罪与圣爱的认识缺乏，“认罪”与“忏悔”就不会被理解为刚强与胜利，而是被误解为软弱和失败。“饶恕”与“和解”不仅也被误解，而且二者还被错误地等同起来，其实，饶恕主要是放弃“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野蛮，主要是主动让受害者摆脱苦毒；而“和解”则比饶恕更进一步，表示了和好如初的意义。两个无法和解的人与民族，也应该彼此饶恕，否则，就会生活在苦毒和仇恨之中，若能更进一步达成和解，则更是进了一层楼。

本期“人学、神学与国学”栏目，收录了厦门大学曹剑波教授的“反思《论确实性》中枢轴命题理论对宗教怀疑主义的批判”，与复旦大学哲学院成静博士的“存在一位神吗？——对安瑟伦神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及康德的批驳的考察”；曹教授是国内知识论研究的专家，他的这篇文章体现了其系列研究中的最新成果。成博士学成于美国，体现了国内近年来日益加增的年轻神学家研究的成果。“实践神学与中西教会和社会”栏目收录了卓新平教授的“基督教在促进中美关系改善及中华文化发展上的作用”，与孙尚扬博士和韩琪博士的“对北京市大学生基督徒的教会选择及其宗教委身调查分析”。卓教授是中国宗教学界的领军人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所长与中国宗教学院院长，及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其论文不仅有重大理论意义而且在实践上非常切合中国的现实。孙尚扬博士是北京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的教授，韩琦博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助理研究员。他们的这篇文章是对北京市大学生宗教信仰的分析，特别研究了大学生基督徒的教诲选择和宗教委身，对于读者了解当代北京的情况具有权威价值。“中西经典与圣经”收录了王旭博士候选人的“海德格尔论‘再临时刻’的存在论意义”与宁波大学徐雪梅教授的“大义灭亲为公义——《诗篇》82篇‘神’与‘众神’关系透析”。王博士候选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现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其作有重要哲学和神学意义，探讨的是《圣经》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徐教授学成于香港中文大学，是过内少有的《旧约》与希伯来经典专家，其作不仅体现其李焯昌学派的特点，也体现了中国大学的《圣经》研究状况。“教会历史与中西社会”栏目收录了霍克功博士的“试论中国特色基督教”与咸娟娟的“传教、医疗与政治：博德恩医院的创建与西北基督教传播研究”。霍博士是宗教文化出版社的编审，在国家的宗教管理部门工作，其作不仅体现了一个学者在理解国家宗教政策的语境中对中国基督教特色的反思，而且从教会历史的视角入手、对基督教入华的早期历史提供了一些考古的新文献，其解读与诠释，可能会引起学界的不同意见，但这里触及了一个非常重要而有意思的问题。咸女士在西北地区的兰州研读，其作对于我们认识西北地区的教会历史有重要的补白作用。“比较宗教文化研究”栏目收录了张介教授的“和谐社会 - 经济人与德兰修女”与英国汉科克博士的“爱的七重智慧：对《歌林多前书》十三章的儒基比较性阅读”。张教授是香港大学商学院的院长，地位与社会影响都很重大，在世俗主义与商业泛滥的当今世界，作为这个角色的基督徒学者，探讨了经济人与德兰修女在和谐社会中的意义，其参考意义是不同于一般学者的论述与视角的。牛津的汉科克博士则是促进基督教与亚洲交流的重要学者，其作是他研究儒家与基督教对比的系列成果之一，谈论了核心的“爱”之概念。“书评与通讯”栏目收录了本刊副主编肖清和教授与其弟子王丹丹撰写的述评“中国天主教贞女

研究新论：评《基督的新娘：中国天主教贞女研究》，本刊编辑部提供的“陈永涛关于赵紫辰基督论的
博士论文答辩通讯”和“东北亚和平与和好基督教论坛”简讯。

2014年5月于赫尔辛基与济南第三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English Title:

The Lack of Conceptions of Forgiveness/Reconciliation and of Confessing/Repentance.

Paulos HUANG

Ph. D. & Th. D. ,University of Helsinki; Post-doctor, Tokyo University

Kuang Yaming Distinguished Chair-Professor, Jilin University, 130012 Changchun, Jilin, China

Editor-in-chief,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ino-Western Studies

Adjunct-Professor,University of Helsinki

Email: paulos.z.huang@ gmail com